

书 屋 而 今 号 励 耘

——陈垣致李书华

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南北二陈”，说出姓名来大概无人不晓，那就是江西修水陈寅恪和广东新会陈垣两位史学大师。按理籍隶修水与新会，皆为“南人”也，何来“北”乎？盖此之谓“南北”，乃是因两位大师所任职的学校而言，寅恪先生自一九四九年起，始终执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后院系调整，归并于中山大学），而陈垣先生则长期在北京任教，并执掌于辅仁大学（后归并北京师范大学）四十余年，据称很可能是史上任校长职位最长的一位学者了。

虽然“南北二陈”均为国内史学界的巨擘人物，但就显赫的身世以及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来看，毋庸说，“南陈”的名气似更大。所以，与近些年因民国热而常被挂在嘴边的陈寅恪相比，了解陈垣先生的自然要少许多。陈垣字援庵，光绪六年生于广东新会的药材商人之家。因父亲号励耘，故亦以“励耘书屋”自颜其斋，他曾有诗云：“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我九十年代曾于书坊淘着一册《励耘书屋问学记》，书中多为弟子们所写的在陈垣门下求学问道的追忆文章。弟子中最为我们熟悉的应该就是启功先生了，启功当年曾以一个中学尚未毕业的青年，经祖父的老世交、藏书家傅增湘先生的引介，拜识了陈垣先生。那时启功生活困难，无力进学，正须一份职业贴补家用，陈先生看了启功投师的文章后非常赏识，就安排了启功在辅仁大学附中教初一班的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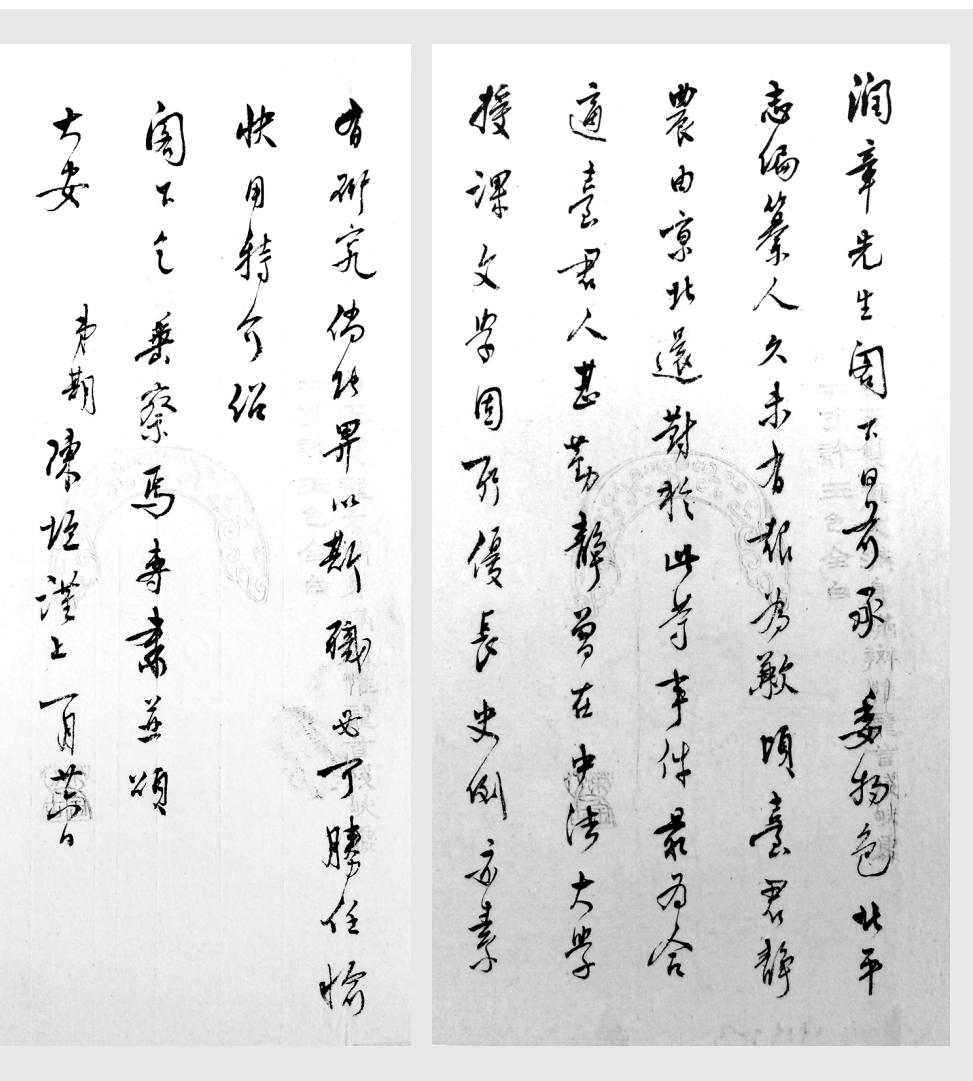
然而好景不长，启功那点可怜的学历被辅仁附中校长认为不合制度，故教了没两年而被解聘。后陈垣先生根据启功擅长绘画的特长，又安排他进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结果还是由于学历太低的原因，又被再度解聘。无奈的启功只能自己卖画求生，如此又过了两年，关键的时候，仍是援庵先生伸出援手，他力排众议，第三次让启功走进辅仁，这次是招至自己的门下，直接聘启功这位“中学生”教大一国文了。

正是因为陈垣先生的执掌，认定启功是一可造之材，然后循循善诱，春风化雨，最后终于成就了一位大学问家。此后每每回忆陈先生的知遇之恩，启功都非常的感慨，他是励耘门下著名的四大弟子之一，师生情谊如同父子。九十年代初，恰逢老谢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启功将自己的书画作品义卖所得一百六十多万港元，全部捐给了北师大，并反对以“启功”的名字命名，而是以先生的名义，成立了“励耘奖助学金”，来纪念自己的恩师。

在启功的事例中，可见陈垣先生认定的真才而非学历，其实这也和他自己的经历有关。陈垣幼时“不喜八股，而好泛览”，虽读书广而博，文章也做得好，但不合“八股”程式，考举人两次未中，故他的最高“学历”只是“前清廪生”，也就是秀才而已。不过说到科考，在陈垣先生的身上倒也有过一次“乌龙”事件：那年他到开封参加“光绪帝三旬万寿恩科”的补试，考前有一位甄姓的同年请他代考，他想起自己反正作文速度快，便应承了下来。考试时他一连写了两篇文章，前一篇遣词造句精心构思，完成后又随便发挥，敷衍了事再成一篇，算作给同年而写。不料发榜后他傻眼了，为同年代写的那篇设下多大功夫的文章，却意外中了

谈康有为与上海的关系，必须从老上海的“辛家花园”说起。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漂泊海外多年。1914年康有为回国后，便选择了上海。康有为一到上海，就看了盛宣怀在新闻路16号（今新闻路1010号中华新村）的辛家花园。康有为在辛家花园一住就是八年，在悠然的田园牧歌中，沐浴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康有为寓沪时间与吴昌硕相差无几，与吴昌硕亦多有交往。康有为为吴昌硕写七十寿贺联：“陶潜曾现宰官身，遁世归来做逸民。”康有为一时忘却“遁”字之写法，乃留一空隙，备想起时填写。乃寿期临近，匆匆送呈。吴昌硕展阅，请人补上“遁”，张诸壁间，无察觉者。可见二人情意之深。1921年底，康有为为建“游存庐”于上海愚园路。康有为在上海走完了人生的最后13年。

在辛家花园发生的最为人乐道的是徐悲鸿在这里拜康有为为师，而且康有为在辛家花园促成了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喜结良缘。徐悲鸿第一次见到康有为时，康先生已经年近六旬，这时他已经不再收弟子了，但是，当他见到徐悲鸿这位气宇轩昂、一表人才的年轻人的时候，康有为竟喜不自禁，马上答应破例收徐悲鸿为入室弟子。这样，几天之后，在辛家花园康宅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徐悲鸿跪在地上向老师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拜师之后，康有为邀请徐悲鸿住到自己家里，让他为家人及朋友画像，同时在国文、金石、书法、绘画等多方面给予徐悲鸿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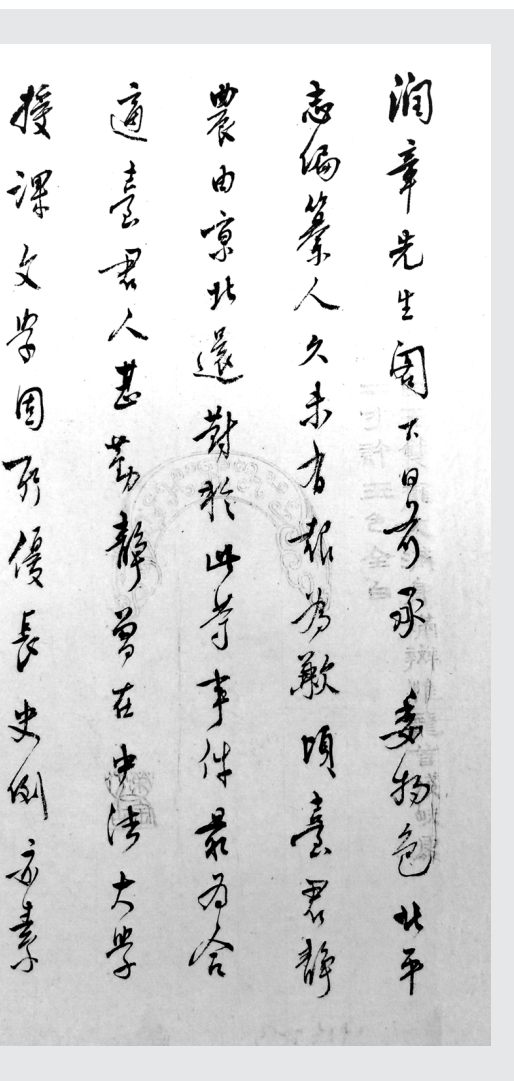
举；而自己那篇所谓的精心之作，却不合考官之口味，再次落榜！从此他对科举仕进之途心灰意懒，再也不抱兴趣了。

虽然放弃了科考，但他从未放弃过学问。陈垣先生后来成为国内顶尖一流的学者，全凭自学。他十二岁时于私塾老师的书架上偶然发现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书中例举了很多书名，下面注着此书是谁所著，有多少卷，哪个刻本最佳等等，从此他懂得读书和做学问的门径。其后他又让父亲为他买了《二十四史》《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等书，潜心攻读，为他日后之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

陈垣先生的学术领域主要在于宗教史、元史、民族史以及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和避讳学等研究。他三十七岁时，正式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元也里可温考》，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关注。日本的权威杂志《史学杂志》立马做出反应，评论该论文“方法科学、理论正当、材料可靠”，并说陈垣这个人在学术上前途可畏，本来他们并不看好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出了这么一篇文章，他们感到压力了。

不料还有更大的压力尾随其后。数年之后，陈垣写出了他元史研究上更重要的一部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虽仅八万余字，却被蔡元培先生称为是“石破天惊”之作！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学界大佬均予以极高之赞誉，这部经典著作出版后，基本也奠定了陈垣作为世界级学者的地位。据陈寅恪的学生戴家祥回忆，寅恪先生与其一同散步时曾说：“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静安（即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其次是陈垣。陈垣先生学问踏实，德才兼优。”以寅恪先生独立孤傲之秉性，能有如此评价应非虚言也。

上海档案馆珍藏的一批近现代名人手札中，有一通陈垣致李润章之函，信中主要是向李推荐台静农任《北平志》编纂之事，



从中也可见陈垣先生对年轻人的提携爱护之心。

润章先生阁下，日前承委物色《北平志》编纂人，久未有报，为歉，顷台君静农由京北还，对于此等事件最为合适。台君人甚勤静，曾在中法大学授课，文学固所优长，史例亦素有研究。倘能界以斯职，必可胜任愉快。用特介绍阁下，乞垂察焉，专肃并颂大安！

弟期陈垣谨上 一月廿六日

此函上款的“润章先生”，名李书华，河北昌黎人，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曾执教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九二九年，他与李石曾创建成立北平研究院，由李石曾任院长，李书华任副院长兼理院务。该院从成立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年间，李书华为该院的建设、组织和发展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平研究院成立后，属下的史学研究所为了保存地方历史文献，他们第一项工作就是准备编纂《北平志》，陈垣、马衡、顾颉刚等七人为编委会委员。编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李书华也参加，确定《北平志》的编纂体例、范围内容等，这是一个非常浩繁的系统工程，推荐得力合适的编纂人员也相当关键。毫无疑问，陈垣先生此函应该就是在在此背景下而写的。尽管《北平志》由于体量过大，后又因抗战事起，研究所颠沛流离，辗转多地，故最后其实并未完成，但在开始的五六年内依然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

信中推荐的台静农，安徽霍邱人，早年是北大“未名社”中的主要成员，与鲁迅先生交好。二十一岁时考取北大国学研究院旁听生资格，后于辅仁大学任讲师、副教授等，供职六年有余。陈垣先生是辅仁之校

长，故台静农对其执弟子礼甚恭。由于陈垣这封信未署年款，仅落“一月廿六日”，根据内容云“顷台君静农由京北还”一句来揣度，可能是在“一九三五年”。因为这里之“京”乃指南京，“北还”当是指《北平志》的编纂所在地今谓北京也。查《台静农年谱简编》，台静农一九三四年七月，因有共产党嫌疑而被捕，随后被解送至南京司令部囚禁，后经蔡元培、许寿裳、沈兼士等营救，于一九三五年一月获释“北还”。台静农被捕之事，陈垣先生也非常关切，其间还专门致书北平宪兵司令部副司令蒋孝先，证明台静农“在校安分守己，未闻有不稳言动，此次被捕，想系冤诬”云云，为台君开释而证明。

所以当台静农一月解禁“获释”时，陈垣先生自然是第一时间就知道的，他深知台君刚刚“获释北还”，极需要一份工作收入以解燃眉之急，于是想起以前《北平志》曾物色编纂人员之事，故立马驰函北平研究院的实际管事的副院长李书华，推介台静农。尽管此事可能后来并未实现，从台静农的年谱简历上看，也从未到职，然陈垣先生对年轻人的真诚帮助以及他爱才惜才之心，足见一斑矣。

学问之余，陈垣对书法也有很大的研究兴趣。在《台静农往来书信》一书中，就收有与陈垣先生的十来通书札，其中就有数次涉及书法话题。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台静农致陈垣先生的信中，提到了“手谕及承赐睽叟唐卷札先后奉到”，因为台静农极爱明代倪元璐书法，“喜其高古，借医俗笔”，而沈寐叟恰是写倪元璐黄道周一路的大书家，故陈垣先生怀着“宝剑赠英雄”之心，成人之美，则将自己所藏转赠与静农了。台静农一九四八年后去了台湾，于小说家之外，又成为著名学者和书法家，虽缘于他的勤奋和天分，但更与他早年在北大的经历，以及受到陈垣、鲁迅、胡适、陈独秀、沈兼士、马衡等一批大师的熏染不无关系。至于陈垣先生的书法，虽无书家之名，但同样佳妙而颇有可观。我们从此两页书札来看，其书法俊逸秀美，瘦硬凝神。大凡经历科考的文人土子，写字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训练，陈垣先生的书法，以行楷行书见长，尤其是小行书，介于米芾和董其昌之间，写得行云流水，既疏朗又自然。启功曾撰文回忆说，陈垣先生写信，喜用花笺，他给人写扇面，好写自己作的笔记、小考证等，往往先数好扇骨行格，再算好文词字数，哪行短，哪行长，写到最后总是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识印章，天衣无缝！对于前人书法之喜好，陈垣是“尊帖抑碑”，恰与包世臣、康有为相左。这一点启功受先生的影响似也不小，我们看启功之书或也可知一二。陈垣先生也并非偏恶北碑，只是他以为后世的碑版屡经翻刻，往往已失古人之妙，远不如真迹影印之真。

如时人写字，好以《淳化阁帖》为宗，而陈垣先生则认为《淳化阁帖》一类，乃宋人以枣木板摹刻，后世再不断翻版刻印，愈发失真，令人学之，似难以从中窥得古人真谛。据说有一位退位的大总统，好临“淳帖”，笔法学包世臣。一次有人拿着他的字来问陈先生写得如何，陈先生笑着说“写得好啊”，人问好在何处？这回陈老憋不住，不无幽默地揶揄道：“好到连枣木纹都写出来了！”

笔者没有想到《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征稿启事》一出，就像一桩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迅速在微信上传播开来并引发热议。

对此事反映最快的可能要数中国书法家论坛坛主齐玉新了，多年的总编工作让他有一种职业的担当与新闻的敏感。第二天，老齐就在微信平台发出《第六届书法兰亭奖，你这是跟我逗着玩呢啊？》被不少网友转发。笔者也拜读了此文，感到老齐是言之有理，比如，对“兰亭奖”的设奖问题他觉得是“不严肃”的，“原来第一届叫获奖、获奖提名。第二届至第五届，叫一二三等奖，到了第六届又叫金银铜奖。就一个获奖名称，不能固定下来？你让书法界之外的人咋理解兰亭奖的奖项啊？”另外，“从一至三届入展名额的600人，到260人、到198人，最后到了现在55人。”的确，这名额的调整让人心存异议。

看完老齐的文章后，笔者又读到了网络批评家汲古斋主人撰写的系列评论《我对六届兰亭奖的思考》。汲古斋主人对此届“征稿启事”可谓是逐字逐句进行了分析与注解，他对评委的期望值很高，他说“这一次兰亭奖就是华山论剑，那评委必须是高手中的高手，应该是书法界里面的独孤求败”。二位评论家的文笔幽默犀利，所以颇受读者喜欢，笔者有时也被二位那种关爱书法的激情所感动。

“兰亭奖”毕竟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奖项，最高奖理应有个规范的、严格的评审机制。有时，围绕“兰亭奖”展开一些讨论也是必要的，只要出发点没错，导向对头，是可以坐下来听一听的。当然，随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其审美标准也应该作一些相应调整，也需要建立一些新的评审准则。

至于“兰亭奖”的初始定位是否准确，可能当时人也考虑不到那么远，因为事物只有在经过一定的过程后才能实现它自身的发展。初始的不完美还是要承认的，想想这最高奖一开始就把名额放到了600人，而且入展又谓之“创作奖”。所以，老齐说“入展的也叫获奖？难怪现在很多人写简历的时候都说自己获得某届兰亭奖创作奖，概念上乱七八糟的”。如今，中国书协对“兰亭奖”进行了新的“定位”，就难免让一些人接受不了。但如果我们将“兰亭奖”与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美术金彩奖、中国曲艺牡丹奖、中国舞蹈荷花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奖项相比较，或许就能够找到一些“答案”了，慢慢化解心中的惆怅。大家知道，2015年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不是针对某一个奖项，而是全国性的所有文艺奖项。记得媒体曾报道中国文联发声而“瘦”，减少了八百多项奖励，所有的文艺奖项获奖名额不超20个。“兰亭奖”与其他文艺奖当然在其中，今年的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名额也由30名压缩到15名，而且不评梅花大奖和二度梅花奖；第十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也对声乐、钢琴、古筝名额严格控制；去年的第十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在获奖名额上也定为20名。“兰亭奖”的改革并非中国书协突发奇想，这是坚守艺术规律的需要，这是为了打造权威奖项的需要。

笔者对“兰亭奖”的关注主要在四个方面：

其一，关注评委。汲古斋主人说此届应该请书法界的“独孤求败”人物去当评委，这标准有点高，但力推大家公认的专业评委是应该的，必须的。中国文联出台了《中国文联全国性文艺评奖评委库建立实施规范》，但是，多年的专家评委和书法专业委员会的产生模式可能还没有完全进行配套改进。

其二，关注评审。笔者不赞成“平摊”的想法，有人说“兰亭奖”的金银铜奖包括篆刻，理论一共才20名，34个省市自治区平均下来也只有半个多点。如果像电影百花奖中的“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奖，仅一名，可能就更难评出来了。《中国文联全国性文艺评奖管理办法》已下发，关键在于落实。

其三，关注征稿。应该肯定“兰亭奖”的征稿比有的文艺奖项征稿做得到位，有的文艺奖可能只有“集体推荐”，没有“个人参评”，“兰亭奖”坚持了这一好的做法。此届还有一个“亮点”，在参评者个人基本信息表上强调了作者的“品德”方面的情况。

其四，关注公示。近几年，中国书协实施“网上公示”受到了众人称道。笔者觉得还可以完善一些，在公示入展名单的同时是否可以同时将作品一起公示，这样可以更好监督。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十一届“国展”和第四届“兰亭奖”，从公示的名单上是难以发现问题的，但在展览上就被观众发现了问题。

的确，“兰亭奖”的名额减少了，这意味着它的竞争更激烈了，对作品、对作者的“含金量”要求更高了。面对“兰亭”，或许就像一首老歌写的那样：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只有矗立在风中，想你！

海派书家捭谭(十三)——康有为

指导。在康家，徐悲鸿浏览了老师收藏的大量历代书画、碑帖作品，并将《石门铭》、《鬻龙颜》等名碑临摹多遍。在老师亲自指点下，徐悲鸿得“宗碑派”真髓，艺术造诣突飞猛进。徐悲鸿与上海大同学院教授蒋梅笙之女蒋碧微一见钟情，他决定为这对年轻人穿针引线，并说服了蒋梅笙。1917年5月，徐悲鸿与康有为商量，准备在春暖花开之际，携蒋碧微赴日本写生。康有为先让徐悲鸿躲进辛家花园，“失踪”几日，临行前由蒋碧微化妆潜出。赴日前夜，皓月当空，康有为设宴为他们饯行，他举杯道：“祝贺悲鸿与蒋小姐私奔成功！”然后弃杯提笔，写了“写生入神”四个大字赠给徐悲鸿留念。

有人说，康有为的名著《广艺舟双楫》也在这“辛家花园”完成，是不对的。戴小京先生在

《康有为与清代碑运动》一书中指出：“《广艺舟双楫》初稿与1889年北京的南海会馆汗漫舫内写成。同年底，他怀着满腔报国无门的惆怅，回到广东，在故里西樵山之滄如楼以17天时间修成全书。”另据张伯桢所编《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载，此书在光绪十五年(1889)脱稿后，“光绪辛卯(1891)刻，凡十八印。戊戌(1898)八月，庚子(1900)正月两奉伪旨毁版”，在当时的条件下，七年中印刷达十八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出版数。何况在清政府下令毁版后，《广艺舟双楫》依然流行。仅在康有为生前，日本就以《六朝书道论》为名翻印六版。近世论书者，无论赞成与否，对这部书都是相当重视的，可见《广艺舟双楫》在书学上的重要性。最重要的为《广艺舟双楫》，这是晚清最重要的书法理论专著，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书风。

康有为在书法上力倡北碑，其书自成一格。康体书法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以圆转为主，长锋毫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拙、浑重和厚实效果

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结体不似晋、唐敬侧倚扁，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康有为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也有人认为这是表面上虚张声势的火气。潘伯鹰先生评说康有为的字“像一条翻滚的烂草绳”。认为康有为线条没有质感，滥用飞白，显得很虚浮。康有为在笔法上力倡圆笔，反对方笔，这是造成他笔法单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笔无尖锋，收笔也无挫锋，提按不是很明显，线条单一，缺少变化。粗笔时可见松散虚空，不够凝敛紧迫，当是一病。用墨上缺少变化，表现形式不足，起笔饱蘸浓墨，行笔中见飞白，仅

此而已。从他的中堂作品来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这是对帖学否定所致。实质上他早年日课，还是以欧虞为主的。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生、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因康氏是广东籍书法家，对50年代后的港、台、澳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康有为还是一位教育家。梁启超、罗翯公等人就是他早年在广州云衢书屋、万木草堂的学生。尤其是梁启超成为他政治变法的追随者。其实，康氏也是位艺术革新家，一贯旗帜鲜明的倡导变法。1915年，徐悲鸿在上海拜见他时，康氏提出“卑薄四王，推崇变法”，徐氏与刘海粟、萧娴都成了他的书法弟子。可以说，从政治变法到艺术变法，不仅使他个人声名大振，给民国书法、篆刻、绘画的创作、研究都带来了新的生机。鉴于徐氏、刘氏等人久在艺术院校任教，影响之深远是可以想见的。

兰亭·想说爱你不容易

杨祖栢

简斋闲语